

黃遵憲〈香港感懷〉與王韜〈香港略論〉

蔣英豪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

黃遵憲(1848-1905)的〈香港感懷〉十首，與王韜(1828-1897)的〈香港略論〉，一是詩歌，一是散文，看似無關，但二者的內容卻出奇地相似。錢仲聯《人境廬詩草箋注》在注〈香港感懷〉第五首的「沸地笙歌海」、「排山酒肉林」、「連環屯萬室」、「尺土過千金」、「黃金千萬積」等五句和第八首的「馳風馬百驍」、「街彈巡赤棒」兩句時，曾引用〈香港略論〉的材料作注釋。¹ 可惜他沒有進一步闡發二者全面而深刻的關係。事實上黃遵憲〈香港感懷〉十首詩中九首有與〈香港略論〉相同的內容，九首合計，雷同者達二十多事，看來並非偶合。如果說〈香港感懷〉是「詩化」了的〈香港略論〉，並不為過；黃遵憲在寫〈香港感懷〉的時候，他似乎是一手拿筆，一手拿王韜〈香港略論〉的。我們把這兩件作品拿來比較分析，可以對〈香港感懷〉的創作過程和寫作方法有進一步的了解，也可以加深對二者之間文學關係的認識。

〈香港略論〉寫於1865年（同治四年）到1866年（同治五年）之間，是王韜因上書太平天國遭清廷緝捕而逃亡來港後三年。² 〈略論〉開頭一段說：

旅居多暇，勤涉書史，以香港僻在一隅，紀述者罕，於是旁諏故老，延訪遺聞，成〈香港略論〉一篇，聊以備荒隅掌故云爾。³

¹ 錢仲聯：《人境廬詩草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頁69-70，72-73。

² 王韜〈香港略論〉說：「甫里逸民東游粵海，荏苒三年。」（載王韜：《弢園文錄外編》，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260）王韜在1862年10月11日（同治元年閏八月十八日）到香港，則此文當作於1865年到1866年之間。

³ 〈香港略論〉，頁260。

可見篇中資料，都是他親自訪求所得。全篇共二千三百餘言，分述香港的名稱、居民、職官、兵防、房舍、設施、賦稅、教育、宗教、游樂、傳統風習、習尚、通商等事，是早期介紹香港狀況較為全面、詳細的文章。王韜到香港的頭一年，由於亡命異地，環境劇變，心情惡劣，對香港印象極差，在日記和給友朋的書信中滿紙怨言。事隔一年，他在1863年（同治三年）年底寫九言長詩〈寄黃六上舍潘大楊三兩茂才〉，雖然仍不免怨誹，但已表示香港生活也有可樂之處。⁴ 來港三年，大抵知道回國無望，要作長期居港的打算，他才放開懷抱，以客觀記述的筆墨，寫了〈香港略論〉，其時距英國佔領香港島已有四分一世紀。⁵

王韜雖然說寫〈略論〉的目的只是「聊以備荒隅掌故」，但從文章的措詞、表達方式以及文末近三百字的一段議論看來，他顯然是以史家的身分，記錄香港實況，討論香港和中國的關係，特別是如何透過香港「師夷長技」。他「論」的是香港，立腳點和目標卻都是中國。這是晚清較開明的知識分子看世界的普遍模式，是因感受到濃厚的危機感而形成的。黃遵憲寫〈香港感懷〉也不例外。

〈香港感懷〉是黃遵憲少作中的名篇，廣受詩選家的垂青和詩論家的注意。⁶ 此詩

⁴ 〈寄黃六上舍潘大楊三兩茂才〉詩中開頭也數說了居港日子之苦，但後來筆鋒一轉，也說了一些香港的好處：「我今誇述非以動君聽，至其佳麗誠足甲南陔。南村楊梅北村之盧桔，香蕉黃橙不論錢可售。紫綃紅繒徑寸之荔枝，王珧下酒風味欺蝸蚌。粵西善鱸粵東尤善鱸，薄肌細理沃醪雜薑蕒。此其小者不過誇口腹，若臨山水閱歷深綢繆。」見方行、湯志鈞（整理）：《王韜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212。

⁵ 英國派遣軍隊，由琉璜號(Sulphur)艦長卑路乍(Captain Edward Belcher)率領，於1841年1月25日（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三）在香港島水坑口登陸，翌日(26日)英軍艦隊到達，正式佔領香港島，並命名登陸地點為Possession Point（佔領角），英文地名沿用至今，其時距〈南京條約〉簽訂還有十九個月。參余繩武等（編）：《十九世紀的香港》（香港：麒麟書業有限公司，1994年），頁43。

⁶ 近年出版的黃遵憲詩選注本，如鍾賢培等的《黃遵憲詩選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5年）、劉世南的《黃遵憲詩選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李小松的《黃遵憲詩選注》（香港：三聯書店香港分店，1987年）、曹旭的《黃遵憲詩選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年）、鍾賢培等的《黃遵憲詩選》（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等，都選了〈香港感懷〉。一些近代詩的選本，如錢仲聯的《近代詩鈔》（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和《中國近代文學大系·詩詞集》（上海：上海書店，1991年）、郭延禮的《近代六十家詩鈔》（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1986年）等，也都收錄此詩。評介這組詩的論文也有不少，如高拜石的〈黃公度香港感懷詩〉（載《古春風樓瑣記》，臺北：新生報，1978年）、伯子的〈晚清兩詩人筆下的香港社會〉（《嶺南文史》1984年第1期）、鄧景濱的〈新派詩篇第一章：論黃遵憲香港感懷十首〉（《嶺南文史》1995年第1期）等是。

寫於1870年（同治九年；其時他二十三歲）初游香港之後，距離英國佔領香港島已近三十年。這年秋天他從嘉應到廣州應鄉試，不第，取道香港經潮州回家。他在香港逗留了多久，我們雖不得而知，但相信不會太長，應該只有幾天。⁷ 此行的成果，是十首五言律詩組成的〈香港感懷〉。詩歌涉及的範圍相當廣闊，包括香港的割讓及地理位置、城市的建立與發展、香港所見的西方文明及新奇事物、香港的歡場、香港的富庶繁華、割讓香港對中國的深遠影響、國土淪喪之痛等。在大都會色彩繽紛、紙醉金迷、令人目眩的環境下，他仍然像其他晚清知識分子一樣，固守「中國本位」，著意於「何以利吾國」的觀點。這與王韜寫〈香港略論〉的目的如出一轍。

黃遵憲在香港逗留時間之短，與〈香港感懷〉中對香港認識的深與廣，是很不成比例的。他對香港的認識，主要來自王韜的〈香港略論〉；他受到這篇文章的啟發，擷取其中資料，配合一己的閱歷與觀感，加添一些在〈略論〉寫成之後出現的新事物、新材料，寫成有自我風格的〈香港感懷〉，以表達他對中港關係的看法。他在創作過程中很倚重〈香港略論〉的資料，但他並非照搬而已。他帶我們從詩的角度去看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初期的香港，他是自覺地以「以詩記事」的「詩史」自居的。

二

〈香港感懷〉如何受〈香港略論〉的啟發，如何把其中材料剪裁、放大、縮小、轉換語意以及「詩化」，以適應他的創作需要，都是值得我們討論的地方。

大體來說，〈香港略論〉的主要內容，〈香港感懷〉都具備了，但黃遵憲作了一些剪裁，刪去了一些不合用的材料，也加進了一些他深感興趣的新材料。黃詩沒有涉及的材料主要是香港名稱的由來、香港居民的來源、香港政府的組成、香港的稅收、香港的教育、傳統風習等。他捨棄這些材料的原因是不難理解的。這些材料或是寫舊的、過去的事物，與他著眼當前的、新事物的基調不太相符；又或是資料的意味太強，不適合寫詩。

至於黃遵憲在詩中加添的材料，主要有香港的異國風情（如西人的外貌、服飾、語言、貨幣等）、新落成的大會堂博物院、香港的水陸交通及輕氣球等。這些材料的加添，也是不難理解的。王韜久居上海，在墨海書館（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Mission

⁷ 據吳天任《清黃公度先生遵憲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1870年中秋節（9月10日）時黃遵憲尚與友人在廣州，其後才到香港，而九月已身在潮州。他在潮州聞其仲叔黃翰藻死訊，即馳歸，回到嘉應時是九月三十日（10月16日）（頁11-12）。由此推測，黃遵憲留在香港的日子不會很長。

Press)任職十三年，接觸過不少外國人。⁸ 他對外國人和外國事物並不覺得陌生，因此在〈香港略論〉中並不當作香港的特色加以介紹。但對黃遵憲這位剛從嘉應出來的青年，香港的異國風情卻很吸引他的注意，他急於要把這些新事物寫進詩中。香港水陸交通的繁忙，對他來說是商業社會動力的表現，也使他留下深刻印象。輕氣球這種會飛上天的新穎飛行工具，更使他有奔向新世界的聯想，是他後來在詩歌中一再寫到的。⁹ 至於大會堂及其內的博物院，是在1869年（同治八年）11月2日才落成啟用的，王韜寫〈香港略論〉的時候，它還不存在。¹⁰ 黃遵憲游香港時，博物院開幕還不到一年，他把這樣新的事物也寫進詩中，並且還鋪衍成一首完整的詩（第七首，也是十首中唯一一首內容完全為〈香港略論〉所無的詩），可見他並不以王韜的〈香港略論〉自限。

除了這些剪裁增刪，〈香港感懷〉和〈香港略論〉大部分內容都重疊，相同之處極多。下面試舉幾個例子。

〈香港略論〉：「香港四周約百餘里。」¹¹ 〈香港感懷·一〉：「諸侯百里封。」¹² 都說香港的面積。

〈香港略論〉：「英人未至之先，為盜窟。」¹³ 「在曩者，獸所窟，盜所藪。」¹³ 〈香港感懷·四〉：「盜喜遁逃藪。」¹⁴ 都說香港的盜賊。

〈香港略論〉：「香港不設關市，無譏察征索之煩，行賈者樂出其境。」¹⁵ 〈香港感懷·四〉：「關吏莫誰何。」黃氏自注：「港不設關。」¹⁶ 都說香港是自由港。

⁸ 關於王韜在上海與外國人的接觸，參羅香林：《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香港：中國書社，1962年），頁44-45。

⁹ 黃遵憲第一次接觸輕氣球是在香港。據高拜石〈黃公度香港感懷詩〉，「當時香港東區渣甸山腳，設有輕氣球的遊戲，供人乘坐」（頁399-400）。黃氏對此物情有獨鍾，除了〈香港感懷〉外，在其他詩中也再三提及，如〈今別離〉第一首：「所願君歸時，快乘輕氣球。」（《入境廬詩草箋注》，頁516）〈陸軍官學校開校禮成賦呈有栖川熾仁親王〉：「亦有輕氣球，凌風騰千尺。」（《入境廬詩草箋注》，頁245）〈登巴黎鐵塔〉：「何時御氣游，乘球恣來往。」（《入境廬詩草箋注》，頁566）

¹⁰ 王韜後來寫〈香海羈蹤〉（載《漫游隨錄·扶桑游記》，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在重複〈香港略論〉所提及的許多事物之外，也加進了大會堂和其內的博物院（頁63）。

¹¹ 〈香港略論〉，頁260。

¹² 《入境廬詩草箋注》，頁64。

¹³ 〈香港略論〉，頁261，264。

¹⁴ 《入境廬詩草箋注》，頁68。

¹⁵ 〈香港略論〉，頁264。

¹⁶ 《入境廬詩草箋注》，頁68、69。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未經批准，不得翻印。

〈香港略論〉：「有巡捕廳專管巡丁，港中晝夜有丁役，分班邏察，往來如織。」¹⁷
 〈香港感懷·八〉：「街彈巡赤棒。」¹⁸ 都說香港的警察。

但黃氏在引用〈略論〉的材料時，往往賦予藝術的加工，並非抄書。為方便討論，我們可把這些「藝術加工」簡略分為幾類：

一、把原材料放大，加以補充，使之更具體、更詳備。如〈香港略論〉說：「太平山左右皆曲院中人所居，樓閣參差，笙歌騰沸，粉白黛綠，充牣其中。旁則酒肆連比，以杏花樓為巨擘，異饌嘉餚，咄嗟可辦，偶遇客來，取之如寄。」¹⁹ 寥寥數語，在黃遵憲手上，先化成第五首的「沸地笙歌海，排山酒肉林」，²⁰ 這已遠較原文形象化而且生動，但他意猶未足，還動用了第六首全首去寫歌臺舞榭的紙醉金迷：「便積金如斗，能從聚窟消。蠻雲迷寶髻，脂夜蕩花妖。龍女爭盤鏡，鮫人鬥織綃。珠簾春十里，難遣可憐宵。」²¹ 又如〈略論〉提到港督，只說「其官文有總督」，²² 〈香港感懷〉與此對應的有第四首「官尊大呼藥」一句，黃氏自注：「官之尊者亦稱總督。」²³ 此外，他還在第三首加了一句「酋長虬髯客」去摹寫港督外貌的特色，在詩中留下了當時的港督麥當奴(Richard Grave MacDonnell, 1814-1881, 1866-1872在任)的畫像。官方檔案畫像所示，麥當奴蓄有連鬚鬚鬚。²⁴

二、把原材料較冗長的文段濃縮成簡短的語句。如王韜因為他的基督教背景，對宗教特別有興趣，²⁵ 在〈香港略論〉中有一段長達二百多字的介紹香港宗教狀況的文字。黃氏當時對西方宗教所知不多，興趣不大，在第三首中只用「寶塔禮耶穌」一句加

¹⁷ 〈香港略論〉，頁261。

¹⁸ 《人境廬詩草箋注》，頁72。

¹⁹ 〈香港略論〉，頁263-64。

²⁰ 《人境廬詩草箋注》，頁69。

²¹ 同上注，頁70。

²² 〈香港略論〉，頁261。

²³ 《人境廬詩草箋注》，頁68。錢氏注「官尊大呼藥」句云：「大呼藥，北周職官名，見《周書·盧辯傳》、《北史·盧同傳》。」(頁68)按「大呼藥」為鮮卑語音譯詞。《周書·盧辯傳》列大呼藥為正六命之官(北京：中華書局，1971年，頁405)，《北史·盧同傳》則列為六命之官(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1102)。

²⁴ 從官方檔案畫像看，在麥當奴以前的幾位總督，都不蓄大鬚子，留小鬚鬚的也只有第一任總督璞鼎查(Henry Pottinger, 1789-1854, 1843-1844在任)一個。

²⁵ Paul Cohen指出王韜在1854年(咸豐四年)受洗入基督教，見Paul Cohe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20。

以概括。²⁶ 又例如王韜因為身歷其境的切膚之痛，在〈香港略論〉中有如下的一段文字介紹香港房價、地價之昂貴：

華民所居者率多小如蝸舍，密若蜂房，計一椽之賃，月必費十餘金，故一屋中多者常至七八家，少亦二三家，同居異炊，尋丈之地，而一家之男婦老稚，眠食盥浴，咸聚處其中，有若蠶之在繭，蠶之蟄穴，非復人類所居。蓋寸地寸金，其貴莫名，地球中當首推及之矣。²⁷

自述苦況，頗為深刻。黃遵憲由於只是過客身分，無意深入探究香港的居住問題，他便只在第五首中用「尺土過千金」一句加以概括。²⁸

三、把原文散文質直的文字「詩化」。例如〈香港略論〉中寫當時香港的煤氣街燈：「於上環建煤氣局，夜間街市燈火，咸以煤氣炷燃，光耀如晝，仰望山巔，燦列若繁星，尤為可觀。」²⁹ 黃遵憲在第三首中則以「火樹銀花耀」去描寫這種景象。³⁰ 煤氣燈柱與煤氣燈本不是甚麼有詩意的事物，但經過黃遵憲用「火樹銀花」加以詩化，色彩馬上璀璨起來。又如〈香港略論〉中提到香港的馬場與賽馬，黃遵憲在第八首中用「馳風馬百驍」一句去表達，³¹ 這是很濃縮、很形象化的詩的語言。百驍與古人行酒令投壺之戲有關：矢從壺中取出，復投中壺，百發百中，謂之百驍。³² 這裏借以寫賽馬，馬從起點繞場一周跑回終點，就跟投壺之戲的取矢於壺復投中壺一樣，而賽馬也像投壺一樣有博奕的性質，所以他用百驍的典故。

四、轉換語意：與原文寫的雖是同一樣東西，但用意不同。〈香港略論〉寫到當時香港島山巒所見的電報線竿：「自山麓至巔，每相距數十武，輒立木柱，系以鐵線，聯綴比屬，相互不息，是曰電氣通標，用遞警信，頃刻可達。其兵防之周詳如此。」³³ 〈香港感懷〉第一首的「高壘轟狼煙」，便借古人邊塞烽火狼煙直上，去寫筆直而立的電報線竿。〈略論〉提到電報線竿，用意是說明英國人在香港島兵防的周詳，但黃遵憲卻突出了英國利用香港對中國的虎視眈眈，以配合作者憂懼英國進一步侵略中國的「感

²⁶ 《人境廬詩草箋注》，頁67。

²⁷ 〈香港略論〉，頁262。

²⁸ 《人境廬詩草箋注》，頁69。

²⁹ 〈香港略論〉，頁262。

³⁰ 《人境廬詩草箋注》，頁67。

³¹ 同上注，頁72。

³² 葛洪《西京雜記》卷五云：「武帝時，郭舍人善投壺。……激矢令還，一矢百餘反，謂之百驍。」（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186）

³³ 〈香港略論〉，頁262。

懷」。再如〈略論〉提到太平山頂的旗說：「最高山頂建立一旗，專設兵員，俾司瞭望。」³⁴ 〈香港感懷〉第十首也寫到山頂的旗，但其用意卻在表達國土淪喪之痛：「山頭風獵獵，猶自誤龍旗！」³⁵ 其寓意與〈略論〉完全不同。又如〈香港略論〉說：「前之所謂棄土者，今成雄鎮。」³⁶ 〈香港感懷·一〉用此寫成「居然成重鎮」，然後據此發揮，加了一句「高壘轟狼烽」，³⁷ 使這個「重鎮」成了一個對中國有威脅的軍事堡壘；不單如此，第二首又乘著這個語意，進一步展現對英國以香港為基地、繼續侵略中國的憂懼：「豈欲珠崖棄，其如城下盟。帆檣通萬國，壁壘逼三城。虎穴人雄據，鴻溝未分明。」³⁸ 而第九首也清楚指出英國侵佔香港，目的不單是香港，是志在中國：「指北黃龍飲，從西天馬來。」³⁹ 就這樣，黃遵憲把〈香港略論〉中看似無關重要的一句說話，發展成了全詩的重點，也就是他「感懷」的本意所在。

像〈香港感懷〉這樣取材於散文而寫成詩歌的作品，在中國古典文學中早有先例。李白（701-762）著名的七言絕句〈早發白帝城〉，取材於酈道元（466或472-527）《水經注》中寫三峽景色的一段散文，以抒寫一己遇赦而下江陵的輕快心情，便是最為人熟知的例子。⁴⁰ 李、酈與黃、王這兩對作品，都是散文先出，詩歌後作，詩人以前人的文章為原材料，借用其語句、字詞與內容，以自抒其所懷。由於〈香港感懷〉與〈香港略論〉這一對作品篇幅較長，內容繁富，其所展示的文學關係，也就更為複雜，更耐人尋味。了解其中的關係，有助於我們解決一些原本頗為棘手的問題。

黃遵憲在1891年（光緒十七年）寫了〈人境廬詩草自序〉，總結了半生的詩歌創作經驗，提出了幾條創作方法論，其中一條是「用古文家伸縮離合之法以入詩」。⁴¹ 一

³⁴ 同上注，頁261-62。

³⁵ 《人境廬詩草箋注》，頁74。

³⁶ 〈香港略論〉，頁264。

³⁷ 《人境廬詩草箋注》，頁63，64。

³⁸ 同上注，頁65。

³⁹ 同上注，頁73。

⁴⁰ 見李白（著）、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卷二十二，頁1022-23。

⁴¹ 《人境廬詩草箋注》，〈自序〉，頁3。

般文論家在討論這句話時，由於無法舉出具體例子，往往未能說明此句的真意。⁴² 其實所謂「伸縮離合」，也就是桐城古文家常論及的剪裁取舍、詳略虛實的問題。⁴³ 黃遵憲在1870年寫的〈香港感懷〉，就是以王韜的〈香港略論〉為原材料，運用「伸縮離合」的手法以寫詩的早期嘗試。黃氏在創作過程中，從「感懷」出發，對〈香港略論〉這件原材料進行了取舍增刪、放大縮小等一系列工程，而創造出一件有自我風格的作品。我們明白了〈香港感懷〉與〈香港略論〉二者的文學關係，便恍然而悟「伸縮離合」之所指，而〈香港感懷〉的寫作手法便順理成章的可以作為「用古文家伸縮離合之法以入詩」一語的最佳注腳。

⁴² 〈人境廬詩草·自序〉中說：「嘗於胸中設一詩境：一曰復古人比興之體；一曰以單行之神，運排偶之體；一曰取《離騷》樂府之神理而不襲其貌；一曰用古文家伸縮離合之法以入詩。」（《人境廬詩草箋注》，〈自序〉，頁3）這四者之中，第一、二、三點都比較容易理解，唯獨是第四點，索解不易。黃遵憲在《人境廬詩草》的〈辛亥初印本跋〉中把「用古文家伸縮離合之法以入詩」理解為「以古文家抑揚變化之法作古詩」（《人境廬詩草箋注》，頁1091），顯非黃遵憲本意，因為「伸縮離合」並不等如「抑揚變化」。一般文學理論專著在討論這段文字時，都把「以單行之神，運排偶之體」和「用古文家伸縮離合之法以入詩」相提並論，認為二者都是指「以文為詩」。幾種有代表性的文論和文學史專著都有相同的看法，如郭紹虞主編的《中國歷代文論選·第四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頁130；按：據書中說明，此書先秦及近代部分的主要編寫者為李慶甲及張海珊）、黃保真等著的《中國文學理論史·五》（北京：北京出版社，1987年，頁158；按：此冊編寫者為黃葆真）、郭延禮的《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二》（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1年，頁752）、黃霖的《近代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頁401）等都是。這種看法是有商榷餘地的，最基本的理由是：如果「以單行之神，運排偶之體」和「用古文家伸縮離合之法以入詩」兩者是二而一，則黃氏沒有分列兩項的必要。「以單行之神，運排偶之體」雖可理解為「以文為詩」，「伸縮離合」卻是指剪裁取舍、詳略虛實等創作手法的運用，如〈香港感懷〉寫作過程中所展示的那樣。

⁴³ 如方苞的〈與程若韓書〉說：「來示欲於誌有所增，此未達於文之義法也。……此文乃用歐公法，若參以退之、介甫法，尚可損三之一；假而周秦人為之，則存者十二三耳。此中出入離合，足下當能辨之。」（《方苞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頁181）；其〈與孫以寧書〉則論及寫作中詳略虛實的問題（頁137）；姚鼐的〈復魯絜非書〉提到「布置取舍、繁簡廉肉不失法」（《惜抱軒詩文集》，《四部叢刊》本，卷四，頁十一）；方東樹的〈答葉溥求論古文書〉論到寫文章「必師古人而不可襲乎古人」，要「善因善創」的「離合」問題（漆緒邦等編：《桐城派文選》，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271，273）。方氏所說的離合，是相對於古人文章而言的，合指有所取於古人，對古人的模仿、借用；離指捨棄古人，自立新意。可見剪裁取舍、繁簡詳略是講究「義法」的古文家所關注重視的問題。後來林紓寫《畏廬論文》也論到「用省筆」（「去冗刪繁」、「舉其簡要而棄其駢枝」）、「用繞筆」（「抉深一層」）（《畏廬文集·詩存·論文》，臺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頁444-46）。

了解〈香港感懷〉與〈香港略論〉的文學關係，也有助於對〈香港感懷〉內容與手法的理解。〈香港感懷〉中有些句子，單獨來看很不容易理解，但如果我們以〈香港略論〉作「注釋」，有些困難便迎刃而解。舉例而言，第一首「高壘轟狼烽」一句，從字面上看來，黃氏用了《酉陽雜俎》中所說的「狼糞煙直上，烽火用之」的典故，⁴⁴ 但當時英國駐港軍隊分明不會以烽火示警，黃氏何以會這樣寫？如果我們對照〈香港略論〉，便發覺其中有一段寫電報線竿的文字（見上引），王韜說明電報線竿的作用是「遞警信」，是「兵防」的設施，我們便豁然大悟，原來黃遵憲說的是香港島山巒所見的電報線竿，只因電報線竿是筆直而立的，其作用是示警，他便聯想到古代的狼煙，以之入詩，以寫電報線竿。又例如第三首「火樹銀花耀」一句，單從字面上看，只是泛泛的寫晚上璀璨的燈火，但如果我們對照〈香港略論〉中一段寫煤氣街燈的文字（見上引），便知道黃遵憲寫的是香港島上的煤氣街燈，這樣句子中的「樹」和「花」馬上有了著落（分寓燈柱與燈），我們從中也可以見到他用心之妙。

⁴⁴ 段成式：《酉陽雜俎》（臺北：臺灣學生書店，1975年），前集卷十六，頁91。

Huang Zunxian's "Xianggang Ganhuai" and Wang Tao's "Xianggang Lüelun"

(A Summary)

Chiang Ying-ho

"Xianggang ganhuai" (Reflections on Hong Kong), a sequence of ten poems in *lüshi* (regulated verse) form written by Huang Zunxian (1848–1905) in 1870, draws its source materials mainly from "Xianggang lüelun" (Hong Kong: A Sketchy Discussion), an essay written by Wang Tao (1828–1897) between 1865 and 1866. A close comparison of the two works reveals how Huang tailored Wang's essay to suit his poems and how this attempt led to the formation of one of Huang's major theories of poem writing as proposed in "Renjing lu shicao zixu" (Author's Preface to the Poems of Renjing Lu) in 1891. This article also interprets and elucidates the meaning of some lines in Huang's poem-sequence in the light of Wang's essay which is usually neglected by commentators of Huang's poetry.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